

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會議參攷資料（第二輯）

中共中央辦公廳機要室印發

會議參考材料第二輯目錄

- 一 竺可楨等人典型材料（中國科學院研究知識分子問題辦公室）
- 二 中國科學院數學研究所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材料
（中國科學院研究知識分子問題辦公室）
- 三 在宣傳唯物主義批判資產階級唯心主義的思想運動中如何加強對高等學校老教師的團結改造工作的調查報告（中央統戰部）
- 四 北京大學典型調查材料（高等教育部）
- 五 高等學校科學研究工作座談會記要（中國科學院研究知識分子問題辦公室）
- 六 文化部黨組關於高級知識分子問題的綜合報告
- 七 衛生部對知識分子問題調查的綜合報告
- 八 關於輕工業部門研究高級知識分子問題的綜合報告（國務院第四辦公室）
- 九 鐵道部關於高級知識分子問題情況調查報告
- 十 鞍山鋼鐵公司、建設公司、設計院助理工程師以上高級技術人員情況彙報
- 十一 華北農業科學研究所對待高級知識分子的情況
- 十二 對外貿易部關於行情研究室高級知識分子工作情況調查報告
- 十三 關於中央機關參事、顧問等人員的情況及處理意見的報告
- 十四 國務院文史研究館高級知識分子情況調查報告
- 十五 軍事工程學院關於對高級知識分子工作情況的綜合報告

一、竺可楨等人典型材料

竺可楨：在工作中表現積極、認真、負責，對政府和人民給他的榮譽、待遇和信任表示感謝和滿意；對黨中央和科學院黨組的領導也很尊重，黨中央有關科學工作的指示經常牢記在心，有機會就向有關科學家傳達。在他所負責的工作中較為重要的問題，都主動找張稼夫等同志商量，有時候在個別問題上，黨組個別同志表現對他不夠尊重，他也認為這是看法不同，沒有表示不滿。目前在他工作中存在的主要問題是負擔過多過重。這一問題是他經常提出的（差不多遇到黨員負責同志一有機會就說）。他曾經向張稼夫同志說過，也向秦力生、武衡、郁文等同志提過，說他的工作實在应付不下去了，許多工作放在那裏不管，「現在這些會議實在弄得太多了，許多事情都沒有時間仔細考慮」，他還說「年老了，腦子不行，精力受到限制，搞垮了也沒有什麼好處」等等。

的確，竺可楨的工作負擔是過多過重的。主要表現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工作多。目前竺可楨主要負責生物學地學部的工作。這個學部一共負責領導二十個研究單位，這二十個單位所包括的學科很廣，而且在國際科學合作和重大綜合研究工作方面擔負着許多工作，隨着科學研究事業的發展，學部工作已日益繁重，但目前學部的領導核心

還沒有很好形成，名义上有四个学部副主任，但实际上他們幾乎沒有参加学部的領導工作：陈鳳桐、黃汲清經常出差，偶尔同京，工作也插不進手；童第周則常駐青島；許傑在地質部的工作也很忙。最近建立了一个学部主任办公制度，但副主任到的每次不过兩人。同時，学部办公室的幹部又很少，应付日常工作已感吃力，对許多重要問題更沒有時間很好考慮，不能成为学部主任的得力助手，因此，大小事务就多集中在学部主任一人身上，因此竺可楨的工作負担就特別重。

二、兼職多。竺可楨除了兼任生物学地学部主任外，主要地还担任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全國科普付主席、中國气象学会理事長、中國地理学会理事長、中國自然科學史研究委员会主任委員、中華地理誌總編輯、黃河規劃委員會委員和農業科学協調委員會委員等八个職務，这些職務都有实际工作，或者要他参加會議，或者要他解決問題。而且兼職一多，接觸的面一寬，雜务也就多了，許多研究單位的負責人或研究人員寫信給他或直接找他請示問題，記者找他寫文章，老学生老同事找他談研究工作或人事問題，他自己又常是「來者不拒」，弄得应接不暇。

三、會議多。例如从十月三十一日到十一月六日这一星期中，需要他主持或参加的會議就有自然區劃、米丘林紀念会的主席团會議和總結、学部明年工作計劃、远景計劃、气象学發展

远景、院务會議、科普常委会、接待波蘭專家、学部主任联席會、苏联古生物学家報告會、慶祝十月革命節等大小十三个會議，还有宴会兩次，平均每天要参加兩個會議。这种會議多的情况並不是个别星期的偶然現象，而是經常的。我們曾經作过这样的統計，他每月平均参加會議約四十五次（每次會議一般都在二小時以上），宴会五次。平均每天要有一半以上的時間用在開會，这样，他大部份時間就沉緬在開會裏去了，腦子清醒能夠考慮和处理問題的時候就少。影响了工作。甚至有時候幾個會議挤在一起，都很重要，但多不能去。例如今天（十二月七日）下午就有鄧子恢副總理召集的黃河流域規劃委員會、農業部召集的農業科学協調委員會、農業合作化問題的学习會、胡乔木同志召集的科学家座談会和欢迎民主德國格羅提渥總理等五項活動，以後虽然有个別變動，但还是有三个會議挤在一起。

在上述工作多、兼職多、會議多的情況下，竺可楨的工作、學習、健康都受到了不良的影響。

他經常說，科学院的院長、副院長不能專門做行政事務工作，專門在那裏「提倡科学」，而必須親自参加到研究工作中去，他自己也曾經多次提出，希望在中華地理誌（包括自然和經濟區劃），自然科学史和綜合考察隊等方面多做點工作。的確，在这些方面他具有一定的研究水平和兴趣，也是目前我院較為薄弱的環節之一，他如能实际参加工作，將會作出貢獻。但是

現在連中華地理誌所編寫的一些重要稿件都沒有時間看；自然科學史委員會成立將近一年，工作基本上沒有展開；綜合考察隊的許多報告也沒有時間仔細研究；蘇聯科學院約他寫的論文，題目和內容都有了，但拖了半年，到現在還沒有安靜的時間可以下筆。原來，還經常下所看看，現在也很少了。他曾經說，目前不用說要做點研究工作，就連看點有關科學發展方面的書報的時間都很难找了。他也很羨慕李四光副院長的做法，他說，索性像李副院長那樣，什麼雜事都不管，才能真正做點工作出來。同時，他對這一情況，經常表現煩惱急躁，過去不發脾气，現在偶爾也發起脾气來了。

他對哲學和時事政策的學習一向抓得緊，讀書和听報告他都做筆記，做報告或寫文章的時候也常引証一些馬列主義著作中的文句，還買了一整套的有關書籍，但因為上面說的那些原因常常把這些必要的學習時間也擠掉了。他自己曾下定決心要保證學習時間，並且通知學部：每星期三下午不得召開任何會議。但最近一個月來，只有一個星期三下午能夠學習。因此，現在他買書的興趣也就不怎樣高了，他說，「買了書沒時間看，有什麼用」。

最後，他現在的健康已不如从前了：精神容易疲倦，常鬧小病，開會有時要打瞌睡，過去常喜歡做些運動到公園散步，現在也做得很少了。他自己也有了衰老的感覺，常說腦子遲鈍，記性不好，愛丟掉東西（這星期共掉了文件袋、皮包、演講稿等三件，以後都找到了）等。由

於工作繁重，竺可楨每天要工作十二小時以上，他經常在晚上十一時以後睡覺。早上六時起床，沒有午睡，一天中除了工作就是閱讀書報或學習俄文。一位已經有了六十六高齡的老先生，儘管過去身體不壞，但無論如何也不能讓他每天負擔十二小時以上的工作了，應該讓他的精力，貢獻到最適當的地方，以發揮出最大的效能。

汪猷，四十五歲，南京金陵大學化學系畢業，一九三五年——一九三九年曾留學德國和英國，得博士學位，歷任研究員、製藥廠廠長、教授等職，從事科學研究工作近二十年，現任中國科學院有機化學研究所副所長。

他在解放以前艱苦的条件下，埋頭於科學研究工作，不問政治。解放後六年來思想有相當的轉變，這些轉變表現在：

1、能重視國家交付的任務並為完成國家任務而努力。例如，一九五三年他領導的工作偏於金黴素，經中央輕工業部提出鏈黴素為重點任務後，他抽出一部份金黴素的研究力量而進行鏈黴素的研究。一九五五年輕工業部提出提煉鏈黴素用的離子交換劑的問題，他也能勇於接受並負責推動進行。

2、能逐漸認識到集體研究的重要性，積極進行抗生素研究的組織工作，例如在上海抗生

素研究委員會成立以前，各單位間隔闕很大，互不團結，經領導上對他進行幫助說服後，能作自我檢查，並主動向各單位奔走推動，聯系合作，在某些地方也能作一定的讓步，以搞好團結。他在每次到北京時總去訪問輕工業部的負責同志，爭取研究和生產密切配合。

3、對黨的領導比較尊重，平時有事能找黨員負責幹部商量，重大問題並主動請求黨的幫助，向黨靠攏。他一般的表現驕傲自大、固執己見，但如經黨的決定，在不損害他自尊心的條件之下，向他開誠佈公講清道理，就很快轉變、能接受黨的意見。

思想轉變的原因估計是下列三個方面：

1、黨對科學事業的政策符合於他對科學研究的事業心，從而將個人的事業與社會主義建設密切結合起來。在讀書時代他就對科學極有興趣，非常努力；做研究生時，早上七時進實驗室，一直到半夜才回寢室，有時甚至連吃飯也不顧，解放前，與資本家鬧翻失業後，還自己出錢搞研究工作。解放後，特別是五二年以來，由於親身體會到黨和政府從各方面支持科學工作的發展，對科學事業十分重視，常常舉例說：「過去中央研究院化學所全年經費祇夠買二十磅酒精，現在一個月器材的經費就是二、三萬元，真是不可同日而語。」五三年在院部大力支持下，組織了上海抗生素研究工作委員會，由他擔任主任委員，黨在思想工作和組織工作等方面又給以很大的幫助與支持。這方面汪的體會也是較深的，他曾向北京生物製品所張為申教授介

紹經驗說：「要搞好集體研究工作，必須依靠黨的力量」。

2、歷次政治思想運動起了一定的作用。他曾參加土改、思改等運動，歷次運動他一貫表現比較積極，要求進步。例如，抗美援朝開始時，他自己提名要求到朝鮮去，說：「自己曾經進過工廠，到過農村，現在要求上戰場去受實地的鍛鍊」。

3、政治、學術地位與生活待遇的提高也起了一定的作用。汪猷在科學界中過去並無多大聲望，解放後黨把他作為「後起之秀」來培養，五二年即提為副所長，五三年任上海抗生素工作委員會的主任委員，五五年又任上海市政治協商會議委員、科學院學部委員，無論是政治地位或學術地位，均有很大的提高，更加鼓舞了他的積極性。同時，在生活上，解放以前他曾經失過業，而現在夫婦兩人每月收入有四、五百元，已無任何顧慮。

但與此同時也日益滋長了驕傲自大的情緒，特別是今年柯夫達、拉萌柯夫顧問參觀有機化學研究所後，對抗生素工作評價較高，抗生素的工作報告又送到國務院，學部大會上又宣讀了橘黴素的論文，八月間又出國到比利時出席國際性會議，這些都使他滋長了驕傲自滿的情緒，這雖然主要是由於汪基本上仍受着舊的思想所支配，然而也反映了我們缺乏對他政治思想上的幫助。

現工廠、考察工業，先後在國外三十五年。曾任偽資源委員會的電煉鋼廠、電解鋅廠、電力冶煉廠等廠長、經理之職，並在聯合國文教委員會自然科學組工作過（主要是組織世界科學工作者協會和世界工程學會議）。一九五〇年回國，先任重工業部鋼鐵學院教授，後為該部顧問。

一九五四年春來科學院，任秘書處學術秘書，現為科學院化工冶金研究所籌備處負責人。

葉是化工冶煉專家，在冶煉理論方面的造詣較深，知識也較廣博，進行過電力冶煉、製造合金鋼、高速鋼等研究。曾有論文在蘇聯雜誌上發表過，蘇聯科學院副院長巴爾金院士對他的論文曾讚揚過，這次巴爾金院士訪問中國，曾說：「葉懂得很多，能做很多工作」。

葉有愛國心，工作也較踏實，肯鑽研，但頗自大，好名利，好吹噓，自認為是中國的貝爾納（貝是英國著名科學家）。

一九五〇年回國後，在任重工業部顧問期間，在生產技術方面以及其他方面提出很多意見。如對鞍鋼，曾提出過使用「加壓爐頂」、「氧氣煉鋼」的方法煉鋼等建議，這建議本身是對的，蘇聯現在使用這種方法，但當時鞍鋼在恢復階段，技術設備、水平也不夠，所以未加採納。葉因而對重工業部很有意見。認為自己的建議「一直被官僚主義所忽視」，自己是「官僚主義的受難者」，「在重工業部浪費了五年。」

來科學院後，初為學術秘書，因葉對中國的情況不太了解，又不善於做行政工作，加上他

的自高自大，輕視別人的工作，以及我們幫助不夠，未能積極主動的徵求他的意見，故在工作中發揮他的作用是不大的。後來葉一而再的要求設立冶煉研究機構，因我們對他的專業不夠了解，沒有把握也就遲遲未予解決（後徵求了巴爾金院士的意見才建立研究所）所以葉對我們有意見，說科學院不識貨，看不起他，不讓他作研究工作；在生活上不照顧他，因沒有汽車他就沒有出席过一次政協會議，對沒有被選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他也有意見。

對葉使用得不好，主要的原因是不了解他的學術水平和政治情況；同時又沒有採取積極的態度加以了解與幫助，把他當作「包袱」。重工業部有的同志就認為他「作用不大，麻煩不少；他既喜歡研究工作，不如將他送給科學院好了」。來科學院後，我們對他的看法也不是一致的，有些同志認為他是有一定水平的，至少有一技之長的；有些同志認為他不是「專著」而是「辭典」（思是不是專家，只懂得一般知識），懷疑他作學術秘書是否能夠勝任。同時由於葉長期在國外，妻子又是美國人，社會關係複雜，所以來科學院後沒能充分發揮他的作用。

中國科學院知識分子問題辦公室

二、中國科學院數學研究所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材料

中國科學院研究知識分子問題辦公室

一、對知識分子的政治估計：（分類表附後）

六年來數學研究所大多數高級知識分子是有進步的。除個別人（如孫以丰）保留了反革命立場和反革命思想情緒，解放後一直仍與幾個抱有同樣反革命情緒的人經常聚會談論一些反動言論，偷听「美國之音」，包庇曾參加地主武裝的反革命分子（已被鎮壓），找領導的岔子，打擊黨員以外，一般都是逐漸進步的，其中不少人，進步是相當大的。例如華羅庚「三反」後對黨不滿，經常鬧情緒，並常散佈自己一些落後思想，資產階級思想作風相當嚴重。直到一九五三年我們對他還有反感，心裏鄙視他。當時科學院黨總支及時發現數學所黨員的這樣思想情況，派人下來了解，並叫我們對華的出身，思想作風形成過程，學術上的成就，政治上的估計等作一全面報告。通過這一工作我們對華才有了較正確的估價，懂得應該耐心地關懷他，和尊重他學術上的成就。張稼夫同志也和他作了懇切的談話。通過一系列的工作，他逐漸有了轉變。現在我們認識到，他固然有極深的資產階級個人主義思想，但在我們黨為了人民利益重視科學時，他會感到個人利益與集體利益基本上一致，因而只要我們對他予以足夠的尊重和照顧，他

也會積極地跟着黨走。他解放前雖然同國民黨有些關係，但主要是爲了這樣有利於他在學術上往上爬，並不是真正有反動立場，而且當他看到在人民民主政權之下科學確得到有利得多的發展條件，並且他個人前途得到更順利的發展之後，他也就不會對反革命抱什麼幻想，只有跟着黨走了。目前，雖然他當遇到一些關係到個人利益問題時還會大鬧一陣情緒，發些牢騷，但基本上是積極地愉快地工作着，並且對黨也是靠攏的，有事找黨員商量。其他幾位重要科學家如閔乃大、吳文俊等也感到黨對他們的關懷照顧而表示愉快感激。至於一般的副研究員助理研究員，也是進步不小的，如馮康（助理研究員）在今年「肅反」中交代了他在留蘇時都未交代過的，十五歲時加入過「復興社」的問題，並且積極地參加了運動。在肅反運動中，閔乃大、吳文俊等研究員也能不留情面地展開思想鬥爭。但過去「三反」時有一些羣衆爲了「快一時之憤」提出了一些不當的意見，如說華是「學術上的大販子，政治上的大騙子」，這話使華至今仍懷恨在心，這可以說明方式不正確引起的後果。

二、業務估計：（統計表另附）

解放初，我們對我國學術界估計過低，忽視了少數科學家的較卓越的成就，加以政治上又強調了他們解放前的表現，對科學家採取鄙視態度，因而在一九五一年前曾在工作上引起不少損失。一九五二年以後，通過黨中央的指示及上級黨組織的不斷教育，和近年來國際友人來

往，使我們更好地看到中國科學家的成就。我所除華羅庚享有國際聲譽外（如最近德國科學院請他為德國所編的著名「數學科學百科全書」撰寫「解析數論」部分。）吳文俊在拓撲學上的系統工作也受到國際重視。據留蘇回國的馮康反映蘇聯在翻譯華羅庚、吳文俊的著作，又蘇聯的書上（如在СЫНАКОВ著的振盪論中）就徵引了閔乃大關於網絡理論的工作，並以一節標題為「閔乃大函數」專門介紹他的貢獻。張素誠在拓撲學上的工作也為名拓撲專家波蘭庫拉托夫斯基所知。又如許寶騷在數理統計方面的工作是早已享有國際聲望的。在工作態度上數學所各級研究人員基本上也是好的，大多數白天晚上都進行工作。華羅庚在培養幹部工作上雖有不少缺點，但抓得很緊，督促嚴，百忙中不忘給他們講課。閔乃大、吳文俊等對所裏交給他們的工作（如圖書委員會，指導青年）也都很積極負責。他們的特點是不答應則已，一經答應下來就一定認真作好。只有少數人較疲踏，如越民義只是按部就班作好華羅庚交給他的工作，主動鑽研不夠。只有孫以丰工作消極，晚上忙於搞翻譯得稿費，對研究工作不肯鑽研，王壽仁強調「神經衰弱」，晚上一般不做工作。

我們認為，科學院對於個別科學家的業務估計是不夠的。例如在聘任學部委員時吳文俊就沒有放入，但物理方面黃昆等就放入，似欠公允。又如院裏部分同志（錢三強、錢偉長）及科學界一些人（如彭桓武）對閔乃大估計过低，未把閔列入學部委員也是不合適的。

三、信任問題：

不適當的保密固然不對，但不經正常手續而依靠一些政治上不可靠的科學家自己接洽有關机密的工作也是不妥的，如軍委囑託作一些有關力學方面的工作（我們不知其詳），只通過錢偉長交給新自美國回來未經審查的研究人員（李敏華、鄭哲敏）去做。但在正確估計之下大胆信任，對工作是有利的。如華羅庚屢次出國，基本上沒有出重大的政治上的毛病。今後在國際學術活動中，可以大胆放心派遣一些歷史清楚作風正派的科學家出國，不應束手束腳，但對一些歷史上有問題的人，則應慎重。

四、安排和使用問題：

把高級知識分子安排在適當的工作崗位上可以更好地發揮其專長。一九五二年院系調整把吳文俊從北大調來我所，使他專心研究，近年來獲得系統的重要成績，就是一個例子，但目前在工作安排上，還存在着一些問題。（1）首先是各高等學校還並不是都能作到足夠重視科學研究，有時在學校中還存在着過份強調教學任務重而把科學研究與教學任務對立的「不正確看法」，因此使得一些教授工作不安心，如南京大學的曾遠學在訊函分析方面有很好的成就，他一九四二年關於「雙正交展開」的工作，受到美國評論雜誌「數學評論」的好評，他一九四八—九年的工作刊登在蘇聯和法國的科學院報告上，也受到重視。近年在南大則聽說鬧情緒，不願

教書，想到科學院來。又如南開大學的楊宗磐（函數論方面），四川大學的張世勛（積分方程方面）也有類似的情況，當然我們不能把這些人都從高等學校抽來調到科學院來，但所在學校應該給他們以足夠的研究時間或指定他們培養研究生，以發揮他們的作用。（2）其次，各高等學校之間，特別是在高教部系統與教育部系統之間，沒有作到人材的合理調整。如蔣碩民現在北京師範大學，但他學識廣博，專長微分方程，在綜合性大學似可更好地發揮他的作用，而在師範學院裏根本不必開設專門的微分方程課，他的專長就不能發揮。反之，余介石研究數學教育多年，應該調到師範學院。而現在却在北京農業機械學院任數學教研組主任。又張宗燧在理論物理上有很好的成就，受到國際重視，但因政治上複雜（其父是反動的張東蓀，他本人品質也不好），不能放在物理研究所，北大也不歡迎他，把他放在北京師範大學擔任一般課程，專長不能發揮。（3）讓有專長的學者去做一般的工作。如林在旭（大連海校）、陸志剛（北京動電學院），李英宏（北京鐵道學院）都是閔乃大培養過，可以在網絡研究方面作他的助手的，但現却在各學校擔任一般性的數學或物理課程，而閔乃大方面現在缺乏助手，工作進展很遲緩。唐稚松、陸鍾萬現都在中國人民大學擔任一般數學課程，但他們對數理邏輯有一些基礎，數學所胡世華目前在數理邏輯的研究上孤軍作戰，希望把他們調來充當助手。（4）如何為發展某一學科暫時把人才集中使用，等培養出一批人後再分散出去的問題沒有得到解決，例如

概率論和數理統計是國家建設很需要發展的學科，但目前人材缺乏。現有一定修養的人，有許寶騷，學術成就很高（現在北京大學）；鄭曾同、梁之舜，有一定修養，現都在中山大學擔任其他數學課程，徐××（名字待查）則在浙江師範學院擔任一般課程，王明貞則在清華工程物理系教書。為了發展這一重要部門，應該暫時把這些人集中起來，在二、三年內培養出一批人來，再分散回去。這樣概率論與數理統計就能在我國生根，並開花結果。又如數理邏輯的重要性目前已漸為人認識（不但對數學，並且對哲學，而且對工程技術，如電子計算機乃至自動控制，都是非常重要的），而我國內從數學方面研究它有成績的人僅胡世華（數學所）、莫紹騷（南京大學）二人，而莫在南京擔任一般數學課。

社會活動問題——過多，最突出的有華羅庚，他兼職非常多，經常各種宴會晚會送往迎來不計其數。他由於是全國人民代表和北京市人民代表兩種身份，每年就要有幾個星期的時間參加會議和視察，另外往往為和平運動及文化交流出國，每年兩三次，為時一兩個月以上，再加平日活動，真正做研究工作的時間不到一半了。當然他很能抓緊時間，但也屢次表示不能集中精力在學術上「攻堅」「打硬仗」，而以他的水平及年齡，正是作系統工作獲得更大成就的時期，這點值得注意，反之，一些較年輕而已有卓異成就的人，如吳文俊，則社會活動過少，特別國際學術活動應考慮叫這類人出去，以糾正忙閒不均的現象。此外，黨員科學家的社會活動也應